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周叔莲 刘戒骄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其内涵比经济增长方式更广泛、更深刻。从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约束条件变化以及中央确定的四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看，我国必须按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健全制度保障体系，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资源环境

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是把“增长”改为“发展”，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改动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将对我国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导向作用。本文围绕如何认识和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谈几点看法。

一、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和区别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和区别源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和联系和区别。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早研究的问题之一。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直到20世纪40、50年代，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视为同一概念。之后，经济学开始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区别开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后来，由于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人们认识到继续将二者割裂开来，并认为经济增长只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只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由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核算通常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国内生产总值是总量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速度概念，衡量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的综合指标，也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性、综合性指标。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者都非常关注经济增长指标。然而，如果不顾条件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就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和重大损失。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方法。根据功能性质和稀缺程度确定生产要素的不同投入量和组合，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

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即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优化生产要素质量、配置方式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广泛、更深刻，特别是指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它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经济发展方式是描述经济发展总体性质和特征的一个概念，是指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按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二、为什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切把握发展规律、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改革开放之前已经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调整投资出口消费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中，中央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认识。但是，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理论上讲，发展方式差异源于发展约束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约束，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较小，资本、技术、制度等非自然资源资源比较稀缺，土地、矿产、水、环境等自然资源的稀缺问题还不突出。当时，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本和技术与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相组合，表现为主要依靠增加自然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生产要素的稀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土地、矿产、水和环境等自然资源越来越短缺，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这个变化，要求从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方面对发展方式和方法进行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尤其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要求和根本途径。

其实，由于人均自然资本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开始就受到自身自然资源的约束。延续以往的较少的资本、技术和较多的自然资源相组合的发展方式，必然伴随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峻等问题，只不过这种约束在经济总量较低的发展阶段不明显。如果说矿产资源可以从国外进口，那么像土地、水、环境容量这样的自然资源则

必须依靠国内供给。由于自然资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越来越严峻的制约因素，我国只能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实践上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论述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四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要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客观上要求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为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虽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片面追求并不必然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曾经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状况尤其值得我们警觉。只有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上，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最近，江苏省提出既要温饱又要环保，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东北三省拒绝“黑色”GDP，山西明确不要带血的GDP，浙江也开始从“成长的烦恼”中猛醒，说明只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符合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

三、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点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经济总量仍需保持十几年的持续较快扩张。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在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多个领域进行变革，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广泛而深刻。但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控制在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解决好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确保资源和环境能够持续地为人类和工业发展所利用。

资源环境问题所以成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因为资源环境问题综合性很强，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都与资源环境问题有关。譬如，长期以来，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等资源管理体制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各类资源之间的比价、资源与最终产品比价不合理，价格水平既不反映完全成本，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市场准入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准入标准不健全、不科学等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区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制度落实不到位，布局分散、产业同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没有得到根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利益，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不惜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虽已进入市场，但在工业用地征用和出让过程中政府仍起着主导作用，土地价格扭曲、建设用地规模普遍过大、单位土地产出较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环保行政执法很难到位，甚至形成滥用和掠夺资源和环境的小气候；税收体制和政策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考虑不够。上述问题都涉及到资源环境问题，只有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才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好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等问题，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取得进展。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在过去经济总量较小的时候还可以承受。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扩张到一个新的层级。GDP从1978年364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8001亿元和2006年的209407亿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6年，按汇率折算的世界GDP总量48.1万亿美元，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9%，总量列世界第4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英国、法国之前，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与德国、英国和法国差距较小。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06年中国GDP为9.9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1%，总量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排在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前，与排在前面的美国和排在后面的日本均有较大差距。在今

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和资源与环境利用方式，延续以往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生产规模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将越来越严峻，甚至可能因为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使发展的步伐受到阻挡。

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最近一轮经济增长，我国要素投入和消耗绝对量连年快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的绝对量过大。2006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24.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3%。其中，煤炭消费量23.7亿吨，原油3.2亿吨，天然气556亿立方米，水电4167亿千瓦时。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4.5亿吨，铜372万吨，铝865万吨，乙烯939万吨，水泥12.0亿吨。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1.21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1.23%，没有完成4%的约束性指标。

我国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过大，废弃物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2005和2006年，全国废水排放量连续两年超过500亿吨，化学需氧量连续两年超过140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连续两年超过2500万吨，2006年分别达537亿吨、1428亿吨和2589万吨。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40%左右，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相应地，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日趋严重。2006年，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在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际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Ⅳ、Ⅴ、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60%。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27个国控重点湖（库）中，Ⅴ类水质的湖（库）5个（占19%），劣Ⅴ类水质的湖（库）13个（占48%）。其中，洞庭湖、鄱阳湖、巢湖水质为Ⅴ类，洪泽湖、南四湖、达赉湖、白洋淀太湖和滇池为劣Ⅴ类。西湖（杭州）、东湖（武汉）、玄武湖（南京）、大明湖（济南）为劣Ⅴ类水质。近岸海域四类、劣四类海水为24.3%。渤海四类、劣四类海水为21.7%，东海四类、劣四类海水为52.2%，杭州湾、长江口、辽东湾、珠江口和渤海湾水体均为重度污染。

能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经济快速扩张难免增加能源消费。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9%以上的份额，远高于25.1%的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耗量的28.7%约6.2亿吨煤作为终端能源直接燃烧，硫化物和碳化物排放压力较大，环境质量已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同石油、天然气相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使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36%和61%左右。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数据，2004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77亿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6.58亿吨，中国占世界的17.9%，比2001年的12.7%提高了5.2个百分点，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都具有配置资源和调节利益关系的功能，但其性质和作用方式不同。政府是一个集中决策、层级管理的组织体系，而市场是一个分散决策、自由竞争的组织体系。市场和政府在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市场机制通过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资源环境利用方式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问题。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补偿机制，创造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消除外部性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由于市场体制在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方面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竞争和淘汰落后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并造成不可逆和难以挽回的损失。解决上述问题，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领域，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障碍主要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健全，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在当前尤其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

机制制。当务之急是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治理等外部成本的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信贷优惠和国家投资与补贴政策，扩大节能、节水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范围，硬化资源对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约束。资源领域要完善自然资源有偿开采、有偿使用制度，加快用水、用地、用电和排污全价交易制度建设，使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者共同分担由于资源开采所带来的影响。环境领域要全面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和废弃物有偿排放制度、污染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控制整体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

其次，加强竞争制度建设，处理好垄断和竞争关系，优化竞争环境。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竞争，而且需要公平和有效的竞争。“十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市场化进程向前推进，我国关于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的法制和制度建设得到加强，在放宽市场准入、监管体制改革、纵向结构重组、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立特许经营制度等方面取得进展，地方保护行为有所收敛，竞争在促进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为人们所重视。我国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仍然面临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垄断性并购、知识产权保护 and 知识产权滥用以及行业自律限制定价等难点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颁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为契机，改变长期以来重视产业政策、忽视竞争政策的倾向，将竞争政策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政策，防止并依法惩治各种损害效率和公平的限制竞争行为。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这 20 年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党对我国收入分配的认识逐步深化。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上表述表明，我们党历来重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问题，十七大更加重视公平并进一步明确了处理效率和公平问题的思路 and 原则。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也要调整财政支出，政府要把自己所支付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治安、司法、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确保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为社会的有效运行提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环境。

第四，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我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从现代化的目标和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偏低，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需要继续提高。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但是，在国内需求扩大尤其是人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提高的同时，要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基本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欧美等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是他们在特定时期和条件下产生的。从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均水平看，我国不具备那样消费的条件，从华夏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看，我国社会也不应该接受不健康、不文明、不可持续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但是，与引导生产的政策及实践相比，我国规范和引导消费方面的工作还相当薄弱。落实中央提出的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另一方面要注重运用正确有效的经济法律手段，矫正过于奢侈和浪费资源的消费，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健康消费和绿色消费。

五、要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使用增长方式一词。譬如，在讲到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时，提到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在讲到建设生态文明时，提到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在讲到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时，提出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继续研究增长方式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所以要继续深入研究，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经济增长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专业领域。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的增长，这就需要分析经济系统投入产出关系，分析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质量和利用效率对产出的影响。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生产要素不只是劳动、土地、资本，而且包括技术、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甚至包括制度。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来推动不同，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通过知识、技术及制度不断创新来推动。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经济系统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不断改进和提高生产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路径。随着人们对生产要素认识的深化，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越来越复杂，实现产出比投入的更快增长就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其次，是正确把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需要独立研究的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大体有四种组合方式，即：无增长无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无增长有发展，有增长有发展。这四种组合方式，在经济史中都出现过。其中，前两种组合在一些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出现过，一些欧洲国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一度出现的低增长接近第三种组合，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曾经长期处于第四种组合。从发展阶段看，我国还没有发展到低增长阶段，应该坚决避免出现前两种组合，争取保持第四种组合，这自然离不开对增长方式的深入研究。

第三，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6年我国人均GDP，按汇率计算为2001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4.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7598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60%。我国人均GDP与高、中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并行快速推进期，客观上要求经济总量在较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不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和资源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全方位得以推进。为使经济增长达到以上要求，也必须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